

20世纪初年中国的无政府主义 与资产阶级革命运动

熊 启 珍

20世纪初年开始在中国流行的无政府主义,具有某些与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一致性的特定内容。它的流行对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曾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本文试图从20世纪初年无政府主义与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的联系方面,探讨它对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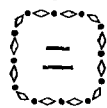


推翻清王朝是20世纪初年无政府主义与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的共同要求。推翻清王朝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首要任务、同盟会的纲领之一,也是20世纪初年无政府主义鼓吹的主要内容。反对强权是无政府主义的基本原则,西欧无政府主义者据此反对资产阶级专政,也反对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为最近目标的工人运动。20世纪初年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者没有简单地照搬西欧无政府主义的信条,也没有仿效西欧无政府主义者的做法。他们认为,中国的“强权”就是清王朝的特权、君权。排“强权”就是排皇,就是推翻清王朝。因而,无政府主义以推翻清王朝为革命的起点。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他们还把无政府主义的“社会革命”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政治革命)联系在一起。无政府主义的主要成员李石曾说:“社会革命必自倾复强权始,倾复强权必自倾复皇帝始。”因此,无政府主义以“政治革命为权舆,社会革命为究竟。”^①有的人声称:“政治革命者,社会革命所必由之”^②。显然,无政府主义者是说“政治革命”即推翻清王朝的资产阶级革命,是其鼓吹的“革命”的第一步,而第二步则是“社会革命”,第一步是过渡到第二步的必经阶段(在无政府主义者看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仅是推翻清王朝而已)。因此,无政府主义的第一个目的便是推翻清王朝。这样,无政府主义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便有了暂时的一致要求——推翻清王朝。由于推翻清王朝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任务,是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因而这种一致性在当时条件下,成了二者的主要方面。虽然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以民族主义来解释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但他们曾再三说明无政府主义与民族主义并非相悖。在革命目标上暂时的一致要求,便是当时无政府主义者对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持积极态度的基本原因,尽管这个革命运动是要建立无政府主义的直接对立面——资产阶级共和国。基于上述认识,20世纪初年的无政府主义者以推翻清王朝为当时斗争的中心。为此,他们多方面揭露、鞭笞清王朝的腐朽、专制,驳斥立宪派反对革命的各种论调,在经济上支助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弥合与革命党人在认识上的歧异。当同盟会内部发生分裂活动时,他们也能支持、维护孙中山的领导地位。这些无疑都符合资产阶级革命利益,促进了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

在推翻清王朝的问题上,无政府主义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基本是一致的,然而也有分歧。无政府主义者对革命派中少数人过分强调满汉种族问题不尽赞同。对于汉民族占多数的中国人民来说,清王朝既是异族统治,又是封建君主专制,后者则是它的本质特性。孙中山曾正确地解释过“排满”问题。他说:“我们推翻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③孙中山强调推翻清王朝所包含的民族、民主意义,但革命派中部分人并未完全接受孙中山的观点。这些人往往只注重清王朝是异族统治,认为“排满”主要就是排除异族统治。这样解释“排满”,无疑削弱了革命的反封建意义,对于整个革命来说是有消极影响的。无政府主义者则注重清王朝是君主专制,强调革命反对君主专制的意义。他们认为,满洲之当排,非以异族而排之,是因其握中国之特权,是因其为皇;对于满洲,惟当覆其君统,即排满人中之皇帝及其臣仆;至于一般满族人民,则不能一概而论、一网打尽;而汉人中助纣为虐者,不能置之不问;干涉吾辈革命之外国政府及其势力也当排。这些观点与孙中山十分接近。他们还批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理论观点“种族既殊,即不能同居一国”,即同居一国,亦当服从汉族统治是狭隘的、“将导致民

族帝国主义,与汉、蒙、回、藏受制于满无异^④。这些观点也无疑是正确的。

革命派中不仅存在片面解释“排满”的情况,还普遍存在过分强调民族主义的情况,作为革命号角的《民报》也不例外。1908年,《民报》曾声明:“本报自二十期起,改定篇次,专以历史事实为根据,以发挥民族主义,期以激动感情,不入空漠。”^⑤用民族主义凝聚民族的力量,号召革命,确是当时革命运动得以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但无政府主义者认为不能“专倡”民族主义,专倡民族主义便使革命变得狭隘。他们指出这样做会使人误认“排满”即革命,“使仇已复,满已排,而社会上种种腐败依然,政治经济之组织如故。而曰仇已复,满已排,吾事了矣”。^⑥这里,无政府主义者提出了一个颇值得深思的问题,即片面强调民族主义,可能导致革命以“排满”开始,以满被排而结束。他们预料这样的革命的结局之一,是“易朝改姓”^⑦。从后来辛亥革命以袁世凯篡权复辟为结局来看,无政府主义者对革命派中某些人过分强调民族主义的批评还是切合实际的。



抨击封建文化和礼教,是20世纪初年无政府主义与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的又一共同要求。对封建专制的否定,必然要求批判封建文化。20世纪初,革命派的许多报刊便对儒家学说等封建文化进行了批判,揭开了近代历史上批判封建文化的序幕。在革命派中,无政府主义者比较重视对封建文化的批判,他们根据革去一切背道逆理的无政府主义原则,对传统文化和纲常名教进行讨伐,在当时的思想文化领域激起了对封建统治的一股小小的冲击波。

他们认为以古人“为万世标准”的中国封建伦理道德观念,是阻碍西方革命文化输入传播的思想障碍。无政府主义者在《好古》一文中写道:“非古人言不敢言,非古人行不敢行”,使思想束缚,知识蒙蔽,做了古人的奴隶,以致阻碍了中国的进化,强调“非行疾雷不及掩耳之革命,以破尽其好古之成见,则新理新学,终不能输入也”^⑧。作者认为人的认识是随时代的发展而不断进步的,“时势更变,新理新学日现,人之见地亦日明”^⑨。所以,今人胜于古人,新胜于旧,应该尊今薄古,而不是尊古薄今。针对当时某些革命党人介绍西方学说时附会中国古圣贤的做法,作者提出革命党人见新理新学“便弹力以发挥之,显明之,以求其实行”,“不必借古人之名”^⑩。这些议论对于破除对圣贤的迷信,促进革命思潮的传播是有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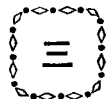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对待东西文化的态度。一般来说,革命派主张用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批判中国的封建文化,但革命派中的一部分人如“国粹派”,往往以汉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为排满革命的武器,因而,他们一方面接受了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理论,一方面又要求保存并发扬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即“国粹”(实系封建文化)。无政府主义者批评他们鼓吹革命的理论武器之一——传统文化是“不正当之道理”^⑪。他们认为中国古文明曾“大裨于全世界之文明”,但这已属过去之事,今天应师法新文明,不应师法旧文明^⑫。他们主张中国宜悉吸受西方“至理精学,以扫荡数千年鄙陋囫囵之旧说。”^⑬他们给“国粹”设想了一个理想的去处——博物馆。无政府主义者虽然主张用西方文化批判中国的封建文化,声称“中国文化进退之如何,当视国粹之受若何之处分”^⑭,但实际上,他们并未真正认识到旧文化是不甘自己沉寂的,必须经过一场新旧文化大激战,用新文化批判旧文化、战胜旧文化,“国粹”才会进入博物馆。因而,他们和革命派一样,对传统文化虽然举起了批判的笔,却并未真正进行战斗,历史只得把批判传统文化的任务留给新文化运动的勇士们了。

纲常名教是封建文化的核心,无政府主义者呼吁进行纲常伦纪革命。《新世纪》发表的《三纲革命》及其它文章指出纲常伦纪是圣贤造的伪道德。目的是“保君父等之强权”^⑮。他们指斥纲常伦纪违背科学真理,损害人权,认为君民、父子、夫妇同为社会之人,非他人属物,各有自立资格,各有其自由权。因此,社会人与人之间应该是人人平等、父子平等、夫妇平等。所谓三纲革命,无政府主义者说,就是思想革命,但与经济革命“有切要之关系”^⑯,子、妇的独立,有赖于经济平等的实现。但他们又把纲常伦纪的废灭与实现无政府和消灭家庭联系起来,以为只要实现了无政府,消灭了家庭,便能实现人人平等、父子平等、夫妇平等,这未免又成谬论了。

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孔子是封建文化的代表和象征,孔学则是封建文化的堡垒,批判封建文化首先就是批判孔子及孔学。1908《新世纪》发表《排孔征言》一文,提出“孔丘革命”主张。作者说:“孔丘专制政府之基,以荼毒吾同胞者,二千余年矣……夫大祀之牌位一日不入火剌,政治革命一日不克奏功。”^⑰作者指出了孔丘与封建专制之间的关系,以及批判孔学与政治革命的关系,因而要求先行“孔丘之革命”。如何行“孔丘

革命”？作者说：必须进行系统的批判，尽集孔丘一生之言行，分门别类，用刮骨破疽之术，“痛加驳斥”，“勿稍留余地”^⑮。作者认为，批判孔丘及其学说是一项浩繁而又艰巨的工作，单凭个人或几个人的力量是做不到的，因而，呼吁志士仁人共同进行这一伟大事业。但革命派瞩目的中心问题是武装起义，也由于无政府主义者和革命派都未充分重视对封建文化的批判，这一呼吁没有引起反响，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孔丘革命”仅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几年后的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不无遗憾地说：礼教的“存废为吾国早当解决之问题，应在国体宪法问题解决之先。”现在讨论已觉甚晚^⑯。陈独秀等人经过对辛亥革命的反思，发动了一场空前的文化领域的革命，声讨孔丘及孔学，以完成辛亥革命准备时期应竟而未竟的事业。从这里可以窥见，20世纪初年无政府主义者的“孔丘革命”正是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的先声。

批判封建文化和礼教是资产阶级的革命任务之一，是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的必然要求。20世纪初年无政府主义者对封建文化和礼教的批判正适应了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的要求。虽然，他们的批判是以无政府主义为归宿，其水平也并未超过革命派，且还流露出崇拜西方文化，鄙视东方文化的倾向，但这种批判还是符合资产阶级革命需要的。它配合了政治上反对清王朝的革命，对当时革命思潮的传播和革命运动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对后来的新文化运动也有所启迪。



在革命方法和策略上，20世纪初年的无政府主义与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也有某些共同点。20世纪初年的无政府主义主张用和平和激烈两手推翻清王朝。所谓“和平”手段指“书报演说”传播革命；所谓“激烈”手段，包括“暗杀”、“罢工”、“起革命军”等^⑰。他们认为革命依靠多数人，便能速成。因此，要使多数人明白为什么要革命，则必须以书报演说唤起人民。革命派也十分重视舆论的作用，曾办过许多报刊鼓吹革命。然而，无政府主义者把宣传教育的作用夸大到了不适当的地位。他们认为只要宣传反对军备、法律、赋税、财产，提倡暗杀，大多数人赞成并实行，清王朝便“不待排而扫地。”^⑱他们提倡“暗杀”，不仅图“诛除一二人道之贼”，而且希望以此激动大思潮，加速革命，他们还认为“暗杀”需要牺牲精神，这种精神可以淘汰、纯洁革命党，坚决革命党之责任心。无政府主义的这种冒险、献身精神，正是革命派所欣赏的、需要的。革命派曾仿效无政府主义者组织暗杀团，向无政府主义者学习暗杀技术，进行过多次暗杀清朝官员的活动，“暗杀”一时成为风气。革命党人的暗杀活动对鼓动革命思潮，推动革命的发展是起了作用的。不过，革命派始终认为“暗杀”只是武装起义的辅助手段，他们针对无政府主义者过分鼓吹“暗杀”，曾指出“当急军人而缓刺客”^⑲。这对于当时正在流行的“暗杀热”无疑是一帖清凉剂。

革命派始终坚持武装斗争，曾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武装起义。无政府主义者支持革命派的武装斗争活动，曾为革命派的武装起义数度提供、筹措经费，《新世纪》周刊对各地的武装起义持赞扬态度，时常报道。与革命派不同的是，他们主张“起革命军”，但仅视为革命方法之一，且认为“今犹非其时”^⑳。显然，他们对武装斗争缺乏信心，这与革命派坚持不懈地进行武装斗争是鲜明的对照。在具体的武装斗争方式上，他们与革命派的主张也不完全一致。他们反对革命党建立一支自己的军队，认为以这样的军队去推翻清王朝是“以暴易暴”^㉑，因而要排斥革命党人提出的“征兵”之说^㉒。他们主张依靠以会党为代表的下层群众的力量，认为中国革命，“舍平民揭竿斩木之外，更无他道。”^㉓因而主张开展会党革命。他们还赞同策反清军，使之反戈。并根据会党已大量渗入军队的情况，提出具体策反方法可从会党入手，认为只要会党出面，以一传百，军队必受其影响，“随波而起”^㉔。这与《民报》的主张有某些接近，《民报》认为革命党除了自己组织军队外，对本属政府的军队，“入其室而操其戈”，彼“失其所恃，抑使为革命者无筹饷备械之多费，事半功十，计莫便于是”^㉕。革命派虽然主张革命党组织自己的军队，但实际上并未认识到建立自己的军队重要意义，因而始终未真正考虑并着手建立自己的军队，只是注意于运动清军与会党。这样看起来，无政府主义者关于武装斗争的具体主张与革命党人的实际行动是基本一致的。当然，他们提出用无政府主义的“非军备”主张，而不是用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去运动清军与革命派是不同的，也是不切实际的。



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无政府共产社会，是20世纪初年的无政府主义者在推翻清王朝后要建立的“理想”的社会模式。这个模式与同盟会的纲领之一民权主义是直接冲突的。民权主义要求推翻清王朝之后，仿效欧美，在中国建立起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发展资本主义。而无政府主义却反对效法欧美，主张革命胜利后就实行“无政府”。多数无政府主义者虽然承认现今世界上“共和最为美政”，较“专制独裁为善良”^㉖，但又认为它仍是少数人执政，多数人不得自由、平等。他们说所谓民权者，

实富权也；自由者，富者之自由也；平等者，富者之平等也^{③④}。这种制度是虚伪的、残酷的、极不道德的。因此，中国绝不能走欧美的道路，“效法欧美，欲重造一欧洲于亚陆，乃极为糊涂”^{③⑤}。

显然，无政府主义者否定民权主义，否定中国革命的资本主义道路，而希望于民权主义之外另寻一条道路。这种否定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民权主义仍代表了当时中国革命的方向，无政府主义者否定它，主张以“无政府”代替，对革命是有消极作用的；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虽然在中国以资本主义制度为归宿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正方兴未艾，但在世界范围内，却已是尾声。社会主义革命正在勃兴，在中国也仅十数年，旧民主主义革命便转变成成为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无政府主义者对资本主义道路的否定，与当时许多资产阶级革命家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怀疑一样，正是世界范围内旧民主主义革命已成尾声在中国的反映，是这个革命临近转变的前奏。由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发生在世界资本主义已进入帝国主义的阶段，因此，中国的资产阶级尽管正在为实现资本主义制度而奋斗，但同时却又对这个制度充满疑虑。资产阶级中许多先进分子苦苦思索着拯救中国的“良方”，他们主张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同时采取某些“社会主义”政策，以弥补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如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章太炎的“直接民权”、“耕者有其田”等，都属于这种“补救”政策。无政府主义者更激进一些，他们不主张学习、修补资本主义制度，而是否定它，主张以“无政府”为革命的归宿。虽然这种否定缺乏科学根据，没有解决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但却并非毫无意义。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在反对封建专制的基础上，正是20世纪初年的无政府主义者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高潮中首先否定了中国的资本主义道路。这无疑有助于人民更全面地认识资本主义制度，重新思考中国革命的道路、方向。

综上所述，20世纪初年，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中心是推翻清王朝，无政府主义正是在这个中心上与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有着一致要求；同时，它对封建文化的批判也符合了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的需要，它主张的各种推翻清王朝的方法，与同盟会也有若干相通之处；另外，它在反对封建专制的基础上，首先否定了中国的资本主义道路，对中国的先进分子继续探寻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有某些启迪作用。因而，20世纪初年的无政府主义在当时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中的作用，就其主要方面来说是积极的。

注释：

① 《革命》，载《新世纪丛书》第1集。

② 《与友人书论新世纪》，见《新世纪》第3期。

③ 《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卷。

④ 《伸论民族、民权、社会三主义之异同再答来书论“新世纪”发刊之趣意》，载《新世纪》第6期；《论种族革命与无政府革命之得失》，载《天义报》第6、7期。

⑤ 《民报》第19期。

⑥⑦②④ 《就社会主义以正革命之义论》，载《新世纪杂刊》之一。

⑧⑨⑩⑬ 《好古》，载《新世纪》第24期。

⑪ 《祖宗革命》载《新世纪》第2、3期。

⑫⑭ 《国粹之处分》，载《新世纪》第44期。

⑮⑯ 《三纲革命》，载《新世纪》第11期。

⑰⑱ 《排孔征言》，载《新世纪》第52期。

⑲ 《孔教与宪法》，载《新青年》2卷3号。

⑳㉑㉒ 《普及革命》，载《新世纪》第15、17、18期。

㉓ 《刺客校军人论》，载《民报》第16期。

㉔㉕㉖㉗ 《去矣，与会党为伍！》，载《新世纪》第42期。

㉘ 《就土耳其革命告我国军人》，载《民报》第25期。

㉙ 《无政府说》，载《新世纪》第31至36期。

㉚㉛ 《伸论民族、民权、社会三主义之异同再答来书论“新世纪”发刊之趣意》。

㉜ 《驳〈时报〉论中国今日不能提倡共产主义》，载《新世纪》第72期。